

毛泽东与“北大红楼”

□ 李梦溪

学党史守初心

毛泽东说：“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这是因为辛亥革命的失败与其后“巴黎和会”的外交妥协，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他们的目光开始从欧美转向俄国的“十月革命”；尤其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主导的新文化运动，熏陶、培育出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而逐渐形成了五四运动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领导骨干。毛泽东与《新青年》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917年。当时，陈独秀猛烈批判封建文化和陈腐落后的旧中国意识形态，声名远播，读者日众，拥有大批青年“粉丝”。这

年3月，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毛泽东写出《体育之研究》一文，署名“二十八画生”（注：繁体“毛泽东”三字刚好是二十八画），投稿到《新青年》编辑部。主编陈独秀看后十分赞赏，立即全文发表。作为地方师范学校还未毕业的学生，毛泽东在《新青年》这样的国家级“权威”杂志发表文章——时年只有24岁。

第二年6月，毕业后的毛泽东为组织湖南的同学赴法勤工俭学，借钱来到北京。由于生活困难，他找到北京大学教授（也是他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老师）杨昌济帮忙找工作。对此，毛泽东有过明确的回忆：杨昌济“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馆长，这个人就是李大钊……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就这样，青年毛泽东开始了他短暂的“北大时期”。

坐落在北京沙滩东街（现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著名“红

楼”，本是北京大学当年的校部，第一层是图书馆，第二层为行政办公区，三四层都是教室。21世纪初，这里已开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基本复原了当年毛泽东工作过的“报纸阅览室”等。同在这座楼里，毛泽东的“报纸阅览室”左边，有陈独秀的办公室，而右边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抚今追昔，遥想当年，二十七八岁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逐步成长为党的英明领袖和惊涛骇浪中中国革命航船的伟大舵手——迈出“最要紧的一步”，就在这间“报纸阅览室”。用今天的话说，也是在这里，青年毛泽东好了他的“第一颗纽扣”。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他当时仰慕已久的陈独秀。由于一年前发表《体育之研究》的渊源和谦虚诚恳的态度，青年毛泽东与陈独秀往来密切，后来到上海又多次见面。他曾回忆自己这一时期的思绪历程和心情说：“我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不过，当时我还在

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李大钊才是引导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经历，弥足珍贵；因为李大钊作为当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与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声誉日隆，李大钊的思想言论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在北大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毛泽东继续认真阅读、研究了当时各种进步的社会科学，首先包括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论文。1918年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又亲耳聆听了李大钊的著名演讲——《庶民的胜利》。这些阅历，使青年毛泽东开始具体地接触、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国际共运”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当年在报纸阅览室，毛泽东的



乐嘉龙 绘

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他曾回忆说：“在这许多名人之中，我得认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辕北辙的图书馆员讲话。”但毛泽东的态度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他很珍惜北京的文化氛围，在北大“仍然

正念思维

科学因普及及而有力量

□ 郑念

日常生活中，越简单的东西，就越招人喜欢，也越有生命力。这是因为，复杂是简单的集成，简单是复杂的简化和普及，简单的背后其实包含着深奥的道理，有时，甚至反映了宇宙的本质，是“大道至简”的真实体现。科学领域也不例外。几千年来，先贤们总是想把纷繁复杂的自然界加以简化，不论是思想的简化，还是物质构成的简化。这个过程也就形成了种种哲学流派和理论体系。从古希腊泰勒斯的“万物源于水”，“万物是气、火、土”，到毕达哥拉斯派的“万物皆数”，乃至中国古代的阴阳学说，都是把复杂的宇宙万物，抽象简化为物质的最小单位，都是抽象思维的结晶。

牛顿多么伟大，但他的F=ma又是多么的简洁，简直就是真善美的统一；爱因斯坦更是家喻户晓，而令他誉满全球的却是E=mc²；还有无所不在的信息技术，现代科技产品都基于斯，长于斯，但其变化的基本元素符号是(0,1)，多么简单而美好。世界宏大而复杂，但组成世界的元素很简单。很多科学道理很深奥，科普就是要变复杂为简单，变深奥为通俗，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理解和运用。所以，科学因普及而简单，因简单而有力量，由此我们可以推理，科学因普及而有力量。

在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事实一再说明，普及得好就发展得好。从科学层面看，科学本质上是高度的抽象，是宇宙本质的反映。从技术层面看，技术越简单就越会被广泛运用，其市场也就越大，也越被不断创新。因为市场大，用的人多，就需要创新。只有创新，才能获得更多的人喜欢，让技术更普及，产品价格就会便宜下来，生产商就可以获得额外利润。

我们不妨假设，科学技术的傻瓜化运用，是科技发展的方向，至少从生活中的例子看来是如此。比如照相技术，大约20多年前，要照出好照片来，十分不易，背一堆器材不说，还总是对焦，又是光圈，又是曝光度，等等，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和要求。直到傻瓜照相机的出现，尤其是手机照相功能的普及，才全面普及开来，几乎人人都会照相。再比如，刚学开车，什么揉搓，过单边双边，总是让人为难。但现在的汽车，大多实行了电子化和智能化技术，几乎不需要人操作，无人驾驶技术也就应运而生，未来也就可以完全不需要驾驶员了。

所以，大凡越是高深的技术，越是需要普及。普及有两层意思：一是技术本身就需要转化应用，比如把复杂的驾驶技术变成简单的傻瓜操作；另一层意思是，把技术原理变成常识，人人知晓，人人都会。不仅能用，还能在运用中创新，利用原理解解决问题。今天的智能化时代，无论生产还是生活，不仅能够普及，而且还能体现人性化。这也可能是“科技以人为本”的含义，是未来科技的归宿。

人们总说未来已来，但我觉得未来一定是一个简单的社会。这种简单不仅是技术的运用，而且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简单美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

科学普及在世界文明、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艺复兴以来，科普唤醒了人类的理智，带来了理性的光辉，从而开启了民智，引起了举世观念的重大变革。理性回归与科学实证相结合，奠定了科学精神的基石，不断引起科学革命，技术变革，产业革命，使得资产阶级近百年创造的财富比历史上所有时期创造财富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新冠疫情防护中的现实再次说明，科普不仅是润物甘露，而且是及时雨。重视与不重视科普的结果具有天壤之别，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

李大钊的《青春》洋溢着科学豪情

□ 刘为民



图片由作者提供

李大钊先生的抒情散文《青春》，发表于1916年9月《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一号，是五四先驱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号角，百年传颂，脍炙人口。但长期以来，我们赞叹其爱国激情、感人肺腑；却很少谈及充溢其间科学知识、科学思想与明确而恰切的科学比拟及蕴喻。

首先，《青春》宣布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宇宙观与科学时空观：指出“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若由相对观之，则宇宙为有进化者”“由哲理言之，绝对与相对也。由数理言之，有与无也”，并“于此广大悠久之宇宙”“当问宇宙自然之青春是否为无尽”。经过科学的历史考察，李大钊先生认为“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他还进一步指出“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精神与气魄”。

李大钊先生例举“唐生维廉与铁特二家，邃研物理，知天地必有终极”“漫云天地，究何所指，殊嫌茫漠，征实言之，有若地球。地球之有生命，已为地质学家所明证”。接着，宣告“虽明知未

来一刹那之地球必毁……仍有对于未来一刹那之地球之责任”。这里，《青春》篇的思想光芒格外耀眼而“醒神”：对比当代社会流行西方的“末世”观点——什么地球生存还剩二百年等等，充分显

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担当和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让今天的我们能够进一步理解并更加崇敬《青春》篇里包涵激愤的科学豪情：“庸得以虞地球形体之幻灭，而猥为沮哉！”

另一方面，李大钊先生也重视“生物学者之言曰：人类之生活，反乎自然之生活也”——“其趋文明也日进，其背自然也日退，浸假有舟车电气，而人类丧其手足矣。有望远镜德律风等，而人类丧其耳目矣。他如有书报传译之速，文明利器之普，而人类失其脑力。……有分工合作之都市生活，歌舞楼台之繁华景象，而人类增其新病。凡此种种，人类所以日向灭种之途者，若决江河，奔流莫遏，长此不已，劫焉可逃！此辈学者所由大声疾呼”——对比现实社会与今天的人类生活，李大钊先生百余年前的这些论说、忠告犹在耳，是多么具有针对性和预见性啊！尤其“歌舞楼台之繁华景象，而人类增其新病”——联系目前传染地球、猖獗不息的新冠肺炎疫情，无异于当头棒喝！

作为北京大学晚辈学子和一名科学文化、科普爱好者，我尤其感谢的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驱李大钊先生，也是当之无愧的科学文化开拓者——他为了说明青春、青年与改造社会的关系，蕴喻类比，取精用宏，既宣

传、普及了科学知识，又表达出唤醒青年、震惊社会的革命“初心”：

吾闻之化学家焉，土质虽腴，肥料虽多，耕种数载，地力必耗，砂土硬化，无能免也，将欲柔融之，俾再反于丰穰，惟有一种草木为能致之，为其能由空中吸收窒素肥料，注入土中而沃润之也。

接下来，李大钊先生贯通文理、跨越社会和历史，抒发了炎黄子孙振兴中华、面向未来的壮志豪情：

青年之于社会，殆若此种草木之于田也。从此广植根蒂，深固不可复拔，不数年间，将见青春中华之参天蔚郁，错节盘根，树于世界，而神州之域，还其丰穰，复其膏腴矣。总之，李大钊先生和他的《青春》篇，是孕育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时代典范；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从思想品格与文化、科学的践行、研究、传播多层面——为我们树立起中华文明建设的崭新里程碑。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

文坛赛先生

红叶石楠映古驿

□ 王谨

应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首古诗。辛丑年清明节前后几天，鄂东春雨霏霏，好在现在无论是城里人或乡下人，撑伞远足的少了，多是乘车代步。

清明假期的前一天，我应黄梅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国平的建议，实地看看该县产业振兴和村容村貌。

年轻富有多朝气的停前镇项宋芳镇长邀我同乘一辆车。从镇党委到童寨村的公路两旁，似花似树的红叶石楠景观树，一棵棵高举着红色的火把，在我眼前连续闪现，那上半部鲜红的嫩叶，像火把也像红花，美轮美奂。

据悉，红叶石楠多做行道树，其杆立如火把；做绿篱，其状卧如火龙；修剪造型，形态可千姿百态，景观效果美丽。红叶石楠因其新梢和嫩叶鲜红而得名。

项镇长说，红叶石楠是古驿一带钟爱的景观树，多数自然村少不了她的身影。

中央确定的乡村振兴谋略，牵动着各地村镇的领头人。用古驿停前镇委书记于小平的话来说，乡村振兴首先是产业振兴，否则没有造血功能，而产业振兴得引进能人。

笔者和项镇长穿过红叶石楠拥有的长廊，到能人治村的两个典型村——蒋冲村和潘家河村。前者引进浙江安吉白茶能人，在蒋冲村成立博禾生态园，组织村民遍种茶叶，发展茶叶加工，打造黄梅黄茶、白茶和绿茶品牌，搞活了一方经济。后者潘家河村，2019引进“80后”在外创业成了气候的年轻能人潘正盛回乡。他任该村村委会主任仅一年多时间，就把软弱涣散村逐渐变为另一副光景：房屋外墙被统一美化，路灯照亮崭新的水泥路，垃圾

山变身绿化带，臭水沟成为清水塘，荒山变成柑橘园……

能人治村，犹如激活一池原没有涟漪之水，带来联动效应。位于鄂皖交界的界岭村领导班子也坐不住了，正在思考利用地处两省交界的区位优势，除发展种养业外，拟联手对面的二郎河界岭打造“十里观景长廊”的旅游品牌。

界岭村原叫铁铺村，因上世纪60年代前，有几家生意不错的铁匠铺，专为鄂皖交界的用户打造刀具、农具之类。到80年代，铁铺村改为界岭村，大抵是因为所处位置在安徽宿松县二郎河镇与湖北黄梅县停前镇之间的交界处之故。其实，鄂皖交界并没有被什么岭所隔，只是铁铺北面有一处山岭而已。这是大别山的余脉，战争年代曾有八路军、新四军及游击队出没山林，屡屡袭击敌人，创造了很多

英雄的神话。

鄂东界岭村民与皖界二郎河界岭的村民比邻而居，鸡犬相闻。他们之间常常过境贸易，互通有无，做些买卖，分享特色文化，方便了各自的生活。每到节假日，皖界二郎河的居民，常常过界到黄梅戏的故乡观摩黄梅戏，或请黄梅县的戏班子到二郎河唱戏助兴……界岭一带古往今来，有许多传说，将这些传说融入十里长廊，是不错的创意，但我想，鄂皖界岭村民不日打造“十里观景长廊”，大抵仍然少不了红叶石楠的守候。

（作者系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观天下

倚孤求真真似铁 以微生有有如森

□ 张悦佳

“不图飞驰之势，不假市场包装，不谋生前显达，一求全力耕耘，二求真而新颖，三求良心安宁。”这句话是我国已故系统科学哲学领域资深学者，复杂性科学中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钱学森思想研究专家——苗东升教授为自己定下的为学、为人之道，也是其一生的写照。苗东升教授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在学术前沿开垦耕耘的一生。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让我们回顾他为系统科学辛勤耕耘的波澜壮阔的一生。

献身科研，教书育人

1937年苗东升生于山西省榆社县的一个抗日家庭，他出生后不到一个月，父亲就在抗日前线牺牲了。母亲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带领全家自力更生，使年幼的苗东升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在他的心灵深处播下爱国的种子，培养了科研报国的情怀。1956年，苗东升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1960年，作为国家急需的特殊人才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三分院工作。1979年调至中国人大哲学系自然

辩证法教研室。任教期间，他呕心沥血教书育人，深受学生爱戴；同时勤奋治学、潜心科研，取得了丰厚的科研成果。

20世纪80年代初，苗东升追随钱学森的学术思想，开始学习和研究系统科学。1985年起，系统科学研究所即成为苗东升学术活动的中心。1987年至1992年，苗东升参加由钱学森指导的系统学讨论班活动。20世纪90年代初，参加由赵光武、冯国瑞等人组织的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的复杂性科学研讨班活动。1994年，苗东升凭借三本科学前沿专著，被评为教授。

2001年苗东升教授退休。退休，对他而言并不是工作、学习和研究的终点，而是投身科研和教育的新起点。他从未放松过理论研究，几乎每天都坚持早上6点起床，晚上10点半休息，从不过所谓周末。他积极参加各种学术研讨活动，继续培养学生；同时笔耕不辍，并且著作颇丰。在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信息科学、逻辑学、钱学森思想、文艺科学等领域有了更深入的研究。2017年，苗东升教授在他

术思想贡献巨大，意义深远。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

苗东升虽已逝去，但丰硕的研究成果以及他不慕名利、潜心治学的精神仍然指引着人们不断前进。在他的学生们眼中，他是“一心赤诚做学问、呕心沥血育青苗”的高尚学者。在社会领域，他以高尚的品德、卓越的学术贡献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与怀念。

北京大学赵光武教授认为，苗东升作为复杂性科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地位不可动摇。钱学森弟子姜璐教授在《复杂性管窥》的“序二”中写道：“苗东升教授是第一位将钱老所提出的理论全面、系统深入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此书所提出的问题，必将引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新的革命”。

苗东升高尚的品格、深邃的思想、未竟的事业，还在继续感召着更多青年人加倍努力，接续前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